

# 亚洲崛起需要中日韩更强大

东亚会不会永远是一盘散沙?答案已经越来越明晰。今天在北京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以及先前三国对“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一致认同,都在对“东亚散沙论”做出强有力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亚洲崛起这一历史命题的响亮回答。

如果说,过去东亚一体化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各国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特别是中国的贫弱,那么今天,当中国崛起已成定局,当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已接近世界的1/5,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就走到了新突破的门槛。

这几年,东亚意识伴随着中国崛起已经在中国民众中兴起。据环球网调查,67%的中国网民支持中日共建东亚共同体,62%认为亚洲需要一个领导国家。调查还表明,57%认为日本在东亚影响力比中国强,而91.7%的人认为,中国

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区域合作的经验表明,区域合作离不开该区域大国的黏合作用。只有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间,通过扎实的合作,建立起应有的机制,并让所有国家尝到区域合作带来的甜头,一体化才会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可以说,亚洲崛起的速度,与中日韩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合作的深度是成正比的。

战后60多年来,亚洲一直没有出现促进各国走向融合的中坚力量,一个缺少中坚力量的亚洲也是一个无法团结的亚洲,它必然要受区域外大国的左右。这样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亚洲国家在冷战后的崛起中,仍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

的逐步建立互信的过程。

现在,有人怀疑,鸠山由纪夫首相一上台,就高调将“东亚共同体”列为外交重要支柱,是意在抢占道德制高点;还有人猜测,中日必然会展开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权之争;也有人担心,历史恩怨、文化差异将是东亚各国很难迈过去的坎;更有人谈及,美国因素将会拖住东亚一体化的“后腿”。

的确,要打破东亚各国之间在商务、旅游、金融、能源、环境、救援、疾病防控和人员往来等诸多方面的壁垒,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远比想象的更困难、更复杂。尤其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国之间

还缺乏互信。任何一方提出的新设想,都有可能引发一些猜忌,进而影响到设想的实施和合作的深入。而受互信影响,摆脱“三国离华

盛顿的距离要大大近于三国之间的距离”的现实,也还需要时间。

可以说,中日韩的合作在考验着三国的胸襟。最需要提防的,就是各种人为的障碍。三国需要在寻找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把手”的同时,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这也是避免重回摩擦,甚至重回冲突老路的关键所在。

我们理应记住“亚洲崛起”的呐喊者、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的话:“21世纪将对亚洲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在过去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一直落后于欧洲社会,它们有追赶西方的强烈愿望。当亚洲为此行动时,‘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就必须得到回应。”▲

## 中国外交60年,决定因素何在

王缉思

### 前30年的主题词是“战争与革命”

纵观中国外交60年,可以看到区分明显的两大阶段和两个主题。前30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后30年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说前30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并不意味着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希望打仗,或者中国外交一直主张激进的革命。实际上,新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环境以发展经济,而且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110年的动乱时期相比,这30年的中国大体上还是和平、稳定、发展的。但在这一时期,战争阴云一直萦绕在新中国上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直到70年代毛泽东论及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时,还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从1950年开始,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印边境、越南和中苏边境,中国对敌军事斗争持续进行。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70年代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都是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做的准备。

至于“革命”这一主题词,也可以大致概括前30年的外交战略。“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那一个时期对外政策的一个基调;1977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还在声明“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70年代中期,针对东南亚一些国家要求中国不再支持当地共产党革命时,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

### 后30年的主题词是“和平与发展”

说后30年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是“和平与发展”,应该是更没有什么争议的。“和平与发展”不是对前30年外交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立足于新时期国内中心任务而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表述,一种期待,一项宣示。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于所处的“时代”、国际格局、国际形势以及战争可能性的总体判断,一直被视为确定党的中心任务的前提。其实,回顾60年的中国政治史,与其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决定了国内中心任务,不

如说国内中心任务的重新确定,反过来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例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就大大降低了。实际上,从客观上看,如果将1982年同1977年相比,很难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按理说都是国际环境恶化、战争危险增加的征兆,但中国领导人反而在1982年作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

从这点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和经济环境做出的判断是有利还是不利,是乐观还是悲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内政治发展方向的期待如何,价值取向如何。当我们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多少学术论证,因为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通过中国60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从另一个角度看,内政也是外交的延续。当毛泽东在1970年果断地决定打开对美关系时,他不曾也不会想到,中美关系的突破引发了一连串的国内政治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假设没有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决策,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会从何时开始,是很难想象的。

中国的外交取向主要由国内政治所决定,并不意味着外交决策不能影响并塑造国际环境。建国后头十几年所做出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等等重大决策,至今仍然影响着同相关国家的关系,仍然是国际环境中的重要因素。近10多年来,中国谨慎处理领土领海争端、两岸关系、朝核问题、中美经贸摩擦、国际金融危机等涉及对外关系大局的问题,既以实力为后盾,又不动辄以武力手段或制裁措施相威胁,展现了外交的成熟,增加了国家的可信度,同时也有助于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 60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

纵观建国以来的外交,虽有前30年与后30年的明显分野,其连续性也是必须强调的。外交一直在为国内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主权统一这四大目标服务。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是30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国家安全

的概念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发展到今天的综合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但核心内容未变;从对苏联“一边倒”到今天积极参与G20,都包含着通过对外交往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目标;对台政策从50年代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今天的“两岸共赢、和平统一”,虽然在表述上有很大差别,但一以贯之的核心目标仍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成统一大业。

### 未来外交政策调整的可能方向

展望未来,“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一定会持续,但是其内容与视角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和平”而言,过去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能否和平共处。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的今天,中国对和平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同局部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相联系,同中国的海外利益相联系。就“发展”而言,过去中国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摆脱贫困落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今则会更加强调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注重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可能方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60年,同外交政策的演变是完全同步的,只不过在近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的变化更为显著。同外交政策为国内政治所驱动一样,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取决于国内政治和舆论导向的变化,而不是国际形势的客观变化。这一研究领域的观点,必须同国内政治导向一致。不过,随着学科发展与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随着学术资源的多元化及国际交流渠道的扩大,学者的观点和对政策的解释也越来越多元化。在符合国家总政策的前提下,国际问题学者的言论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

国际问题研究固然是为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服务的,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和学者个人,如果将追求目标局限于分析现实政治以及向政府进言;学术研究的眼界就不可能开阔,眼光就不可能深邃。中外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终极关怀,一直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此文节选自作者新近完成的课题“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60年”的结论部分,原课题5万多字。)

### 热点热评

北欧人的美国情结终于有了一个抒发的机会。奥巴马执政还不到10个月,一条腿抬起来,还不知道落在何处,挪威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就迫不及待地送了他一个“大礼”。不过,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绝对不是评委们昏了头,或是不负责任,而是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的殷殷期盼之情。

美国人这些年搞的那些东西,北欧人大多看不上。尤其是在核裁军、环保和气候变化的政策等方面,北欧人对美国极其不满。一位挪威人曾如此抱怨:“一个纽约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超过了整个挪威。可瞧瞧布什政府的政策吧,居然可以不理会《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国家怎么配领导世界呢?”

现在,奥巴马终于为美国重新赢得了北欧人的青睐,也满足了北欧人的美国情结。当年,罗斯福上台搞新政,就找了一本介绍瑞典模式

### 给奥巴马诺奖是“赶鸭子上架”?

丁刚

的书来学习;如今奥巴马一上台,意欲实行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这多少让北欧人有了久违的亲近感。那些原本可能很不待见小布什的评委们,现在看到美国有了这样一些进步,自然会高兴得不得了。

记得当年因反对越战而出名的瑞典首相帕尔梅,曾让美国人十分难堪。据说,尼克松政府甚至以降低使馆规格来表达不满。帕尔梅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颇能表现出北欧人的美国情结:“我们曾经把美国作为和平与保护人类基本价值方面的道德领袖和权威,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美国对河内的轰炸感到无比的失望。”只要把这句话的最后略改一下,就能用来表达北欧人对奥巴马的看法:“我们对布什政府的政策感到无比的失望,而奥巴马的新政令我们找回了对美国的好感。”

但把和平奖发给奥巴马也有不好问题,因为按照诺贝尔奖的传统,奖项是应当发给已有的成果,而不是某种理念。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特别强调了奥巴马的“无核世界理念和他为此所做的工作”。

没有人质疑无核世界、核裁军等等是美好的理念,但是,连奥巴马本人也说,无核世界的目标“可能在我此生中”都不会实现。更不用说,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对这一理念持怀疑态度。

一个人因为提出了一些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理念而获奖,这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当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算对奥巴马鼓励鼓励,给他140万美元,也未尝不可。只是这么一来,就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赶鸭子上架”。真不知道,评委们是不是有意给奥巴马“套”上这顶桂冠。而接下来人们要看的,就是奥巴马的“舞步”是否符合评委们的要求了。▲(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本版文章欢迎参与讨论或投稿  
电子信箱:faolun@globaltimes.com.cn